

# 从一张发票说起

周立民

结束了学生生涯，巴金先生就成了以写作为生的“职业作家”，虽然也担任过各种社会职务，但都离不开“作家”这个身份。他的人生经历相对并不复杂，生活内容也比较固定，写作、编辑、旅行、访问、开会等等。巴金的业余爱好也不是很多，看电影，看戏，与朋友聚谈……当然，这里必须加上一个终生爱好：读书、买书。他是个写书人、译书人，也是一位杰出的出书人，读书、买书对他而言，不算是“业余”爱好，而是“专业”行为，然而，大多数情形下，这是一种趣味和习惯，没有功利性。

巴金一生买了多少书，有大体数量，目前还难得精确统计，俗话说，太多了，太多了。但是，他留下来的一张购书发票，却引得我去探寻巴金买书的故事。

这是一张编号为0050425的“上海书店发票”。抬头下是书店地址：福州路401号；电话：282891。上面盖的收款章上有“上海书店内部供应书刊”字样。“上海书店”是今天的上海图书公司的前身，它还曾用过上海旧书店等不同的名字。发票上的户名栏写的是：巴金。下面准确地列出巴金此次购书内容：李伯元的三部小说：《官场现形记》《活地獄》《文明小史》，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都是晚清的官场小说。《牛虻》是伏尼契所写的一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极受中国年轻人欢迎的小说。巴金自少年时代，就是一个小说迷，中外小说不知读了多少，这张发票也是他阅读趣味的显示。在发票的购书详目中有一部重点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套《说部丛书》（发票上记为“丛刊”），计623册，六百元整。发票开出日是1978年4月14日，从当年的物价看，这并非小数目。当天巴金日记中曾记：“今天午睡半小时，两点光景魏绍昌来访，并取去代购书款六百元。”（《巴金全集》第26卷第2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所付正是这笔书款，由此可知，这部书是魏绍昌代他买的。

魏绍昌是近代史料专家，在上海市作家协会资料室工作，与巴金算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在巴

金日记中，不乏托魏绍昌帮忙买书的记录。如：“回家看见魏绍昌在等我，谈了一会，交给他购书费三百元。”（《巴金全集》第26卷第237页）“八天前文联车来，并送来魏绍昌代买书若干种。同小棠坐文联车到新光戏院看法国故事片《巴黎圣母院》，十点四十分结束。坐原车回家，洗澡。看魏送来的书。”（《巴金全集》第26卷第259页）巴金曾回忆他在上海的买书史：年轻时，他常跑四马路（福州路）的书店和旧书摊，常熟路（善钟路）附近几家个体经营的小书店也常去，巴金的很多外文藏书都来自那里。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社会活动多，忙起来，逛书店的时间大减，不要说旧书店，新书店都很少去了。（姜德明：《雨天读书》，《与巴金闲谈》第38页，香港文汇出版社2010年7月版）进入垂暮之年，行动不便，逛书店已不可能，然而，巴金买书的兴趣依旧没减，于是，只好便托人买书。

巴金不是研究近代翻译文学的学者，斥“重金”买这么一大套书，自然不是无缘无故：

我想起年轻时读过一部《说部丛书》，这是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翻译小说，有文言，有白话，全用四号字排印，一共三集，每集一百种。这些话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关在家里也看到外面世界，接触各种生活，理解各样人物。我觉得它们好像给我准备了条件，让我张开双臂去迎接新的思想，迎接新的文化运动。书都是大哥从二叔那里借来的，为了这个我常常想起二叔。“文革”结束，我得到真正的解放后在旧书店买到一部这样的《丛书》，还有未出齐的第四集。我的许多书都捐赠出去了，这丛书我留着，作为感激的纪念，不仅是对二叔，而且也对大哥，对别的许多人。我从他们那里吸收了各种养料。没有从他们那里得来的点点滴滴，就没有今天的我。（巴金：《怀念二叔》，《再思录》第78页，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版）

巴金晚年的确大量捐出藏书，他特意留下这部书“作为感激的纪念”，可见此书对他的特殊意义。这部书牵系着一份久违的亲情，他怀念二叔对于自己成长的影响。这部书也是巴金成长史

中的重要启蒙读物，它打开了巴金的眼界，让他拥抱新思想。不仅是巴金，由商务印书馆于1903—1924年出版的这部书，是很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接触世界文学的重要渠道，在它的读者中有鲁迅、周作人、冰心、林语堂、钱锺书……这些名字。冰心说，到她十一岁时，已经看遍当时所有的《说部丛书》里的书；而钱锺书多年后还饶有兴趣地重读其中的林译小说。这部书对巴金的影响，在他晚年的重要作品《随想录》中也有体现，他谈到《说部丛书》中的《十字军英雄记》：

我十几岁的时候，读过一部林琴南翻译的英国小说，可能就是《十字军英雄记》吧，书中有一句话，我一直忘不了：“奴在身者，其人可耻；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话是一位公主向一个武士说的，当时是出于误会，武士也并不是真的奴隶，无论在身或者在心。最后好像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十年一梦》，《巴金全集》第16卷第3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多年后，巴金仍然记得这句话，他甚至觉得这是自己在某一段时期个人心理状态的写照，他藉此反思某一种集体无意识，进而对历史进行反思，早年的阅读影响人的一辈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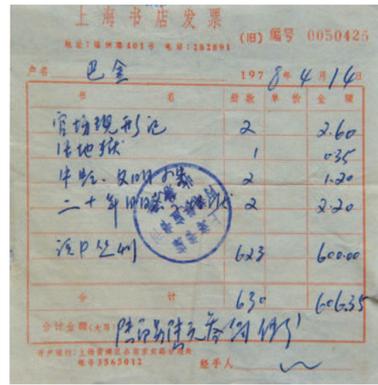
魏绍昌取走书款，书店开票，一周后，书送到巴金家中：“五点坐原车回家，旧书店已把《说部丛书》送来。”（《巴金全集》第26卷第235页）《说部丛书》据学者统计总计324编（十集系列中有两种后来被替换，全书遂由322编增出两编），巴金藏的这套十集系列，共有97编，缺三编；四集系列，有321编，缺一编。两个系列合在一起，只缺四编，不要说个人藏书，就是在公共图书馆的藏书中，《说部丛书》能搜罗如此完整的，恐怕也不多，不少学者研究此书版本，都是依据电子版，原书收藏便尤显珍贵。由此，我们不能不佩服上海书店的专业和搜书能力，它们帮助巴金实现了一个心愿，多年来为保存近现代珍稀书刊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巴金与上海（旧）书店关系密切，不仅托人买书，自己也多次登门。他的日记，随处便可拈出几条记录：1965年4月21日，“上海旧书店送《金日成选集》和《江姐》来。”（《巴金全集》第

25卷第509页）1979年8月23日，“上海书店陈同志送来港版书二三十册”。（《巴金全集》第26卷第361页）1962年12月9日，“上海旧书店期刊部刘同志送目录来”。（《巴金全集》第25卷第192页）三天后，他亲自上门：“去外文书店和上海旧书店西门市部购书若干册，并在期刊部楼上购得《文丛》一卷一至五、二卷一、三（两份）共八册（索价十八元，相当贵）。”（《巴金全集》第25卷第193页）《文丛》是他自己编辑的期刊，抗战的烽火中，为了出刊，他曾带着纸型在日军轰炸下奔走。大约巴金本人也不存，“相当贵”，他也买下来。1963年1月22日，“九点半乘作协车去四马路外文书店、上海旧书店中文和外文门市部，以后又去中图公司二楼购《第四名》、《椅子》等内部读物数种。十点半回家”。（《巴金全集》第25卷第208页）……仅上面几条，就能够看出巴金购书的范围很广，我发现，他特别注意一些朋友间的关联签名本，藏书中很多这样的书，他都买了下来。前不久，还有一位朋友传来一张图片，是一本韬奋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扉页上有韬奋1933年7月5日赠赠东华先生的题签，又有巴金1994年5月11日转赠相关博物馆的题签。这书怎么到巴金手里呢？我判断，多半得自旧书店。

1978年1月16日，巴金过了一次逛书店瘾，同去者是魏绍昌：“九点动身去河南中路新华书店，购内部书，魏绍昌在那里等我。挑好内部书付了款，又去三楼。然后到上海旧书店。……晚饭后张玉珍把我今天上午选购的书送来，很感谢她。”（《巴金全集》第26卷第202页）——我没有认真去查对，不知道对于逛书店来说，这一次是不是他最后的豪兴。年老体衰，这样的逛书店，后来肯定是不大可能了。不过，跟书和书店有关的消息，巴金总是很关心，姜德明曾记：1986年9月，“他竟然也知道上海书店在外滩有个仓库要腾出地方，清理出一批旧书。可见他仍关心书的消息”。（姜德明：《秋日漫话》，《与巴金闲谈》第30页）

在购买中，巴金与上海书店的店员也有了超出顾客和店家买卖关系的情谊，从世俗的角度



巴金1978年4月14日购书的发票

讲，他们之间社会地位悬殊，可是，巴金平等待人的风格在生活中的每一处都有体现。1964年1月26日，“九点半上海旧书店期刊部刘某（他的名字我已忘记）来找我，说是小孩生病，请帮忙，用一九五七年公债换去四十元。”（《巴金全集》第25卷第346页）这是救命，而这位店员，巴金早已不记得他的名字，说明他们并不是特别熟悉，此时店员能登门相求，除了“急”，还是有一种信任，认为巴金会帮助他。巴金晚年，大量向图书馆、学校捐书，有一次还是上海书店的店员帮助巴金打包：“拜访巴金后的第二天，我碰到上海书店的一位青年小许。他很兴奋地跟我说，不久前他同巴老合了影，老人还签名送给他一本书。我问他怎么有这么好的机会？他说，巴金最近又整理一批藏书，有些是自己著作的各种版本，由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派来一位女青年协助整理。这些书要送给北京，书店派他和另一位男青年来巴金家帮助打包。这要一定的包装技术，也要一定的体力。他俩在院内旧车房里工作了两天，把这几十包书送到火车站去托运。最后，他们想同巴老合影留念，巴老欣然同意，还签名送他们每人一本著作。”（《与巴金闲谈》第36页）“小许”当为“许志浩”，“另一位男青年”，应是陈克希。就算巴金是书店的“大客户”，但是这种服务显然已超越了买卖关系。看老前委书记贾与买书人之间的关系，很多这种温暖的细节和难忘的回忆，它打破了买卖的冰冷，让生活 and 世界多了几分人情味，真希望现今的书店，也能有这样的传统。当然，不知道上海图书公司的档案中是否还保存更多的巴金购书记录，如果有，能够找出来，我想这也是书店史中值得记忆的篇章。

2024年5月15日凌晨于竹笑居

「文汇报」 微信公众账号 更多图文请移步“文汇报”App 和“文汇报”微信公众账号

为什么我们能轻而易举地记住儿时的某个电话号码，却总是记不住最近发生的事？这是话剧《887》在开场时提出的一个颇易引起共鸣的问题，以此为起点，加拿大导演兼演员罗伯特·勒帕吉（Robert Lepage, 1957—）带领观众进入了对于记忆宫殿和887大楼的探索。

《887》是今年静安戏剧谷的国际特邀剧目，由勒帕吉自编自导自演，以单人戏剧的形式并配合机器神（Ex Machina）公司制作的“舞台魔方”将他的个人经历搬上舞台，在沪上戏剧圈掀起一片热潮，甚至带来一票难求的盛况。“887”是勒帕吉家的门牌号，他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全剧以此为起点讲述故乡，讲述每个人的所来之处，探讨自我、记忆、历史、语言等于文学和生活而极为重要的主题。

在《887》这部戏中，记忆的呈现方式独具匠心，勒帕吉巧妙地采用双线共行的叙事结构，对近期记忆与远期记忆进行了深入探讨。剧中近期记忆所涉及的事件是勒帕吉受邀参加诗歌节并在背诵《说白人的话》（Speak White）一诗时屡屡受挫，为了能够进行脱稿展示，他付出诸多努力，并由此开始了对记忆本身的探究和思考，引发了本文开头提及的对于近期记忆和远期记忆之

间反差性的疑惑，同时试图重建远期记忆中的童年。

这个“童年”除了勒帕吉的儿时记忆，还有魁北克的历史，这两条并行支线交织呈现。勒帕吉的童年经历主要诉诸家庭的经济困顿和阶级分化，魁北克历史则更多涉及英国对加拿大的殖民和魁北克人民的反抗，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从儿童勒帕吉的视角纳入舞台进行呈现，比如英国女王伊丽沙白的到访，另有一些线索性的意象也将勒帕吉的童年记忆和魁北克历史贯穿在一起，如剧中多次出现的林肯汽车。最终，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交汇在祖母去世

# 我们从何处来？

——静安戏剧谷国际特邀剧目《887》观后

张珊

和戴高乐演讲的重合中达到顶点。剧中多次运用新媒体技术对舞台表演或布景进行放大，而勒帕吉唯一一次将自己的脸呈现于屏幕上，是对童年在姨妈家做客的一次圣诞经历的回忆。他一边向我们陈述自己和妹妹对于这同一个圣诞节在记忆上的分歧，一边手持摄像机为我们详细展示姨妈家的豪华别墅。屏幕上与娃娃屋别墅内景的精巧豪华形成对比的，是勒帕吉不成比例的硕大的脸庞。这张突兀而苍老的脸，是成年之后的勒帕吉对自己童年的旁观和记忆，其中蕴含着自我的分裂，是一个成年之后的“主格之我”对幼

年时的“宾格之我”的观察，另一方面也仿佛一个外来者和闯入者对另一个家庭

和阶层的偷窥和凝视。勒帕吉在访谈中说，他希望通过《887》去探索那些触发记忆之物（memory trigger），某个物件、某段音乐、某种感觉，都可以成为开启记忆大厦的神奇钥匙，在一瞬间将我们带回记忆中的某个情境，让我们重拾记忆中的某种情绪。对于记忆触发器的探究和呈现并非新鲜之事，文学史上最为著名的一例，来自《追忆似水年华》的法式点心玛德莱娜，普鲁斯特的记忆被味觉点亮，由此开启了“找寻逝去的时间”的浩浩漫漫的文字之旅。而对于勒帕吉来说，矗立在Murray大街上的887大楼，广播在不同场合中出现的林肯汽车，广播中传来的美国流行乐，以及父亲驾驶的出租汽车等等，都成为他打开儿时记忆大门的魔法开关。

在对记忆的呈现上，《887》堪称模板地展现了记忆的诸多特征，比如碎片化和非逻辑化，舞台上的各种记忆相互跳转拼贴，记忆中毫不相关的两个场景可以借助舞台技术无缝切换；再如当下性和重建性，剧中对每一个记忆场景的回溯都蕴含着身处当下、已然步入老年的勒帕吉的理解的努力。而其中最显著的，一端则是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相互渗透和相互构建，勒帕吉的童年回忆和魁北克历史在《887》的舞台上水乳交融，这是小人物视角中呈现出的大历史，也是个体在历史的缝隙中发出的声响。

《887》中反映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同构性的另一个重要的连结点是语言，除了对记忆的探索和呈现，剧作也呈现了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压制。勒帕吉所生活的魁北克与加拿大的形成和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魁北克最初被法国殖民，由此奠定了法语及法国文化在魁北克的深厚传统，此后英法两国相互争夺魁北克的控制权，尽管法国在魁北克地区占据优势，但因英国在殖民竞赛中胜出，使魁北克也不得不屈服于英国的统治。魁北克是加拿大的主要法语区之一，多数魁北克人仍然以法语为母语，在勒帕吉的少年时代，法语和英语之间已有高下之别，法语是底层粗鄙的语言，而英语则为上层的、有修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标志，剧作开头提及的那首《说白人的话》就很好地呈现了魁北克人在语言和身份上的这种困境。

《说白人的话》是由加拿大女诗人米歇尔·拉隆德（Michele Lalonde, 1937—2021）创作于1968年的一首法语诗歌，它控诉了英语及英美文化对以法语为母语的加拿大人在语言、文化和经济上的剥削和压迫。正如勒帕吉在一次访谈中提到的，这首诗在提醒我们：“说你的人民所说的语言，而不是强迫他们说更主导性的语言。”耐人寻味的是，《说白人的话》也呈现了两个语言和两种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诗人对英语的压迫和垄断充满怨恨、意图反抗，但同时又意识到在越南和刚果，法语也在行完全相同的正义之事；另一方面，受奴役的魁北克人民反抗着来自于英语和英美文化的压迫，但同时他们也悟到英语文学传统之深厚与适用范围之广阔，因而呈现出一种极为矛盾的心理。这种心理也呈现在勒帕吉的叙述里，他在表演中不时表达着对于法语受到压制的隐忧，但又不由自主地使用英语文学中的典故为他的表演增加亮点——邻居家的狗被命名为“哈姆雷特”，只因它太疯了，勒帕吉调侃幼时的自己总担心这只狗会冲出来给他的父亲报仇，但在英语文学方面缺乏修养的魁北克底层人民可能不太容易领会到这段台词中的幽默。

中国观众在欣赏《887》时很难不注意

到舞台上勒帕吉客厅中挂的一幅书法作品“缘绎创”，这并非勒帕吉及团队为了使中国观众感到亲切而进行的一种在地化处理——对于中国观众来说，“缘绎创”恰恰起到了一种陌生化效果。这三个汉字在汉语语境中通常不会同时出现，因此，这幅书法作品显得有些怪异。在被问及这幅书法作品的意义时，勒帕吉坦言舞台上的客厅正是对自己现实客厅的再现，而这幅书法作

品来自一位日本朋友，他本人对这幅书法作品也非常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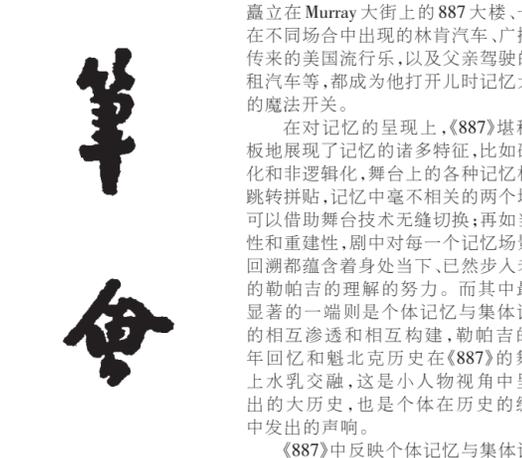
如果抛开这幅书法作品的现实来源，而仅将其置于《887》的戏剧语境中进行阐释，“缘绎创”却能够为我们的解读提供一种思路：“缘”所彰显的是勒帕吉在887大楼中与家人和邻居的缘分，他如何在与妹妹的玩耍中与戏剧结缘，以及日后如何因为学费的原因而就学于戏剧学校，才有了今日的勒帕吉。“绎”在日语中有联系之意，但在汉语中更多被理解为牵绊和阻碍，《887》中的牵绊主要来自于家庭的内部和人际关系，我们看到勒帕吉一家人如何因祖母的到来而不得不重新对家中的房间进行分配，以及由此带来种种不便；这种“绎”也体现于经济和身份上的限制，父亲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日工作到深夜才回家，而入学考试成绩优异

的勒帕吉仅仅因为自己是出租车司机的儿子就被贵族学校拒之门外。“创”所体现的则是语言和记忆如何通过书写和创作得到结合，记忆中的苦涩和遗憾也在表演中得到疏解，而勒帕吉在舞台上所创作出的《887》则成为了一种永恒的纪念。

勒帕吉的祖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这一病症最显著的特征便是遗忘，而如果遗忘了一切，没有了记忆，我们便无从构建自我。勒帕吉在舞台上所呈现的这出《887》，也是一种对抗遗忘留存记忆的努力。戏剧的最后一幕，勒帕吉带我们进入了父亲出租车的内景，舞台上充满了一个中年男人的惆怅、疲惫和无奈，此刻勒帕吉与逝去的父亲合二为一，这是儿辈对父辈的体贴和怀念，也是勒帕吉在舞台上向自己的父亲致敬，向他儿时的英雄致敬，而那座逐一熄灯的887大楼，则象征着童年记忆的逐渐远去，但这些记忆却在《887》中以艺术和戏剧之名得到了永久的保存。

戏剧有不同的戏剧类型，有的以文本见长，不需要复杂的舞美，只要文本充分地呈现文本内容便是佳作，文学史上的很多经典戏剧作品都在此列；有的戏剧则以舞台的戏剧性见长，在表演中充分运用戏剧语言，在观众的眼前“做”戏，从而在舞台上实现对时空枷锁的精彩脱解。《887》当属后者，当然其文本内核也并不逊色。勒帕吉素有“剧场巫师”和“剧场魔法师”的古名，在机器神——“Ex Machina”一词自希腊戏剧中的“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a）转化而来——的配合下，以舞台上的魔术盒子呈现出了一出让观众眼花缭乱的、接不暇的舞台魔法，其舞美装置的复杂和丰富已达到让人惊叹的程度。

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887》失败之处在于装置的尺寸过小，坐在远处的观众必然会错过和遗失许多细节。戏剧表演本应面向剧场和观众，中间蕴含着“距离”这一要素，而距离是表演的假定性和观众与演员观演关系得以形成的前提，勒帕吉和机器神团队显然忘记了这一点。尽管如此，《887》还是极大地阐释了“play”中游戏与戏剧的双重含义，“玩”出了一出精彩纷呈的好戏，向观众充分释放了舞台的魔法、剧场的魅力和来自戏剧的想象力。



图为话剧《887》剧照

